

留英前後

吳鑄人回憶錄之五

● 吳鑄人原著 · 王成聖校訂

辭職回鄉預備留學

民國十八年七月國民黨中央終於決定要河北省黨部改組。事先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陳果夫先生召見我，對我說：「河北省黨部改組在即，蔣介石先生的意思，僅留你一人任委員兼組織部長。」我很慎重的對果夫先生說：「果夫先生，如果犧牲吳鑄人對黨有益處，我就不惜犧牲。如果犧牲吳鑄人對黨並沒有益處，那就不必犧牲了。也許我在其他方面工作對黨還會有更多的貢獻。」

陳果夫先生很詫異的問道：「叫你做河北省黨部組織部長，對你又有什麼犧牲呢？」我說：「我和董冠賢、張清源儘管意見有時不同，但是與他們及河北省各縣市黨部負責同志都曾經共過生死患難。今天要改組省黨部，就僅僅留我一人，我很為難。此外，今天既然要改組省黨部，就不能不改組下級縣市黨部，如不改組下級黨部，又何必改組省黨部呢？下級黨部如由我手上改組，同志們大家會這樣想？『你這個南方佬吳鑄人啊！我們和你共過多少患難，今天你卻毫不留情的把我們改組掉！你究竟有沒有良心啊？』這不

但事倍功半，而且會因此製造出若干仇恨、裂痕，妨礙日後黨務工作的推動，我一定會失敗的。務必請您另找一個適當的同志來主持改組，並請您轉報介石先生，我不能勝任這個任務。至於其他工作，無論多麼艱險困難，只要能力所及，必定全力以赴。」果夫先生聽了我這一番理由之後，表示贊許的點了點頭。

未等河北省黨部的新人事命令發表，我就請辭委員兼組織部長職務，將印件交給秘書傅策夫同志代為辦理移交，自己攜眷回鄉，準備出國留學深造。因為既已預知河北省黨部決定改組，何必留在北方多事呢？這是我從民國十六年到十八年七月，這段期間在河北省黨務工作的實情，也是果夫先生對我作人作事有深切認識的開始。

由於有這兩年多從事黨務工作的基礎，使我對北方情況有相當的了解，認識了許多北方的工作同志。更由於我避免參與河北省黨部的改組工作，保留了良好的人際關係。因此在抗戰勝利以後，民國三十五年，我因偶然的機緣，又奉命出任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時，得到許多北方老同志、老朋友的大力協助，而與共產黨轟轟烈烈的競

爭大幹一場。

爭取時機出國深造

在河北省黨務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我特別感謝陳果夫先生的栽培。在丁惟汾先生任中央訓練部長期間，由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一個「救濟失學革命青年」的方案。辭了黨務工作之後，我就根據這個方案報名應試出國，本「學問為濟世之本」的守則，多讀幾年書。

第一批派出去留學的「失學革命青年」是丁惟汾先生親自主持的，只憑功績遴選，不需經過考試，但我沒趕上。等到辦理第二批時，丁惟汾已辭職，而由戴傳賢季陶先生繼任中央訓練部長。戴季陶堅持出國前必須經過考試及格錄取。我當時年輕氣盛，急於想出國讀書，遂和戴季陶發生爭執，弄得很不愉快。記得我曾這樣頂撞戴季陶先生：「我們既然已經失學，還有什麼好考的呢？即令考試，也應等我們留學回來以後，考我們在國外的學習成績，然後再依成績的優劣來分發工作。如果在國外沒有好好讀書，成績太差的

，可以追繳他的學費，這才是合情合理的辦法，也才是真正獎勵忠貞失學同志之道。所以今天只能考查某人過去對黨的工作經驗和實際表現，以及他對黨的貢獻，論功行賞，派他出國進修深造。」戴季陶聽後，氣得要辭職，自然是不歡而散。後來陳果夫先生對我說：「戴季陶先生因為你的話太尖銳而很生氣。你不要再和戴先生爭辯了。不論考試的成績如何，將來你們都可以出國的；考試不過是爲了要了解你們的外文程度而已，程度不好的，留下來補習，遲些出國就是了。」接著他又問我：「你現在怎麼打算？」我說：「仍回北平去辦大同中學。請您通知河北省黨部，不要把黨務訓練所借給大同中學的校舍收回去。」他答應了，同時轉報組織部長蔣介石先生。蔣先生不但同意，還撥給學校三千塊錢，作爲修建校舍及充實圖書館與實驗室之用。我真是由衷敬佩感激蔣介石先生與果夫先生扶持黨員創業的精神。其後，於民國二十年夏，真如果夫先生所說，我終於如願以償，得到黨的培植而留學英倫，入牛津大學深造。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上，又展開了嶄新的一頁。

協辦北平安徽中學

民國十九年，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爲爭奪國民政府領導權而召開的「擴大會議」在北平揭幕。同年，在北平的安徽同鄉會要革新，並擴充「北平私立安徽中學」。安徽同鄉會非常富有，除了在小站地方有值錢的七千多畝稻田外，還有屬於安徽會館的許多房地產。此外，安徽省在

津浦路上還有十四萬五千元的官股。辦一所中學，實在綽綽有餘。安徽同鄉會原來爲保皇黨的江朝宗及安福系王揖唐、吳炳湘這幫軍閥官僚所把持，我後來搞了一場「革新安徽同鄉會運動」，把這批人統統趕走了。「北平私立安徽中學」從此改由張貽惠、張貽洞等安徽籍學者，以及一群革命青年來主持，校譽自然蒸蒸日上。

由於津浦鐵路的十四萬五千元安徽省的官股，在北伐前許世英任安徽省長時，即已批准作爲北京私立安徽中學基金，因此北平安徽同鄉會就公推我去安慶，請省政府重新確認並將款子撥下。那時安徽省教育廳長是程天放，我和程天放不太熟識，所以當我路過南京時，就決定先打個電話給陳果夫先生，請他幫我寫封信給程天放促成其事，免的我碰釘子。電話一撥通，果夫先生一聽說我到了南京，就說：「你來了，好極了。我立刻派車子接你到我這裡來。」我急著說：「不行啊，我的輪船快開了。您有什麼指示？可不可以電話上吩咐？」他說：「別忙，你先把船票退了，進城來住兩天，我有要緊話要跟你說。」見面後他問明我此行的目的，同時答應盡快寫信給程天放廳長。接著他對我說：「有件要緊事要你辦。這次去安慶辦完事後回北平，對於北方同志，你得多負一點責任。跟他們多多聯絡，傳些話給他們，勸他們不要參加汪精衛的改組派。」對於已經參加的，勸他們不要太絕情，言行檢點一些，大家不要把感情弄得大壞，以後大家還要見面的。既都是國民黨的同志，兄弟鬩牆適可而止，不要搞得親痛仇快。」我說：「這件事我可以

勝任，一定遵照您的指示盡力而爲。」

到了安慶，由於教育廳長程天放及省黨部訓練部長吳念雲的協助，省主席陳調元很快的提請省政府會議決議，將安徽省所持有的津浦路十四萬五千元官股，撥發作北平私立安徽中學基金。大功於是告成。

校產被奪強力反撲

民國十九年在我回到北平之前，一部份老朋友們已經參加了「改組派」，並發起一項運動，要「打倒吳鑄人」。他們第一個行動就是把我從北平私立大同中學趕了出來。這使我很不服氣。大同中學是譚熙鴻校長託我代他辦理的，其間經過多少艱難困苦，現在稍有基礎，竟把我撵走！實在欺人太甚，任誰也嚥不下這口氣。他們這樣對付我的原因，是以爲此番我到南京去了一趟，一定會帶回什麼秘密計劃來破壞改組派，所以來個先下手爲強。

我被迫不得不採取正當防衛手段。於是在天津發動北平前門工會、地毯工會等工人團體的工人八百多名，命羅愛林、周鼎珩等人率領，聲勢浩大，出其不意，直奔大同中學而來！到達目的地後，立刻封鎖現場，不容一人脫逃，切斷電話，斷絕對外交通。衝進校內，見到改組派的人就打，尤其遇到主其事的領導人物，更是痛揍一頓。這的確是一場暴力事件。但這般忘恩負義的人，若不給他們一點教訓，世上還有是非公道天理良心嗎？

起初，羅愛林對於這種大膽的計劃有點害怕



①民國四十三年吳鑄人（右）與夫人合影。

②民國七十二年吳鑄人偕夫人（前左一、二）與孫女合影。



，遲疑不前。我鼓勵他說：「不要怕，只管打。他們挨了打一定會想法報警把你們圍起來，但是我保證，他們早上把你們圍進去，我晚上就有辦法把你們救出來。」他說：「那你自己為什麼不去呢？」我說：「我要是自己也去了，一旦大家全被圍起來，誰來援救？你儘管大膽去做，我一定會救你們出來。」於是羅愛林、周鼎珩、翟大勛等人遂率八百多名工人去包圍大同中學，照計行事。剛巧校長許孝炎以下各主要人物均在學校，看到這麼多人衝進學校，心膽俱裂，呼救無門的被困了八個多小時。後來其中的程序之冒險偷偷翻牆出去，到憲兵司令部報案。當時憲兵司令是楚溪春，一聽工人暴動，這還了得？立刻率領大批武裝憲兵趕到現場，來了個反包圍，把工人及羅愛林等全部逮捕，關了起來！

王揖唐忠告閻錫山

當晚由在六國飯店留守的翟大勛打長途電話到天津，向我報告行動實況及被捕經過。我立即去見王揖唐，我說：「揖老，我們安徽人倒楣了！羅開榜的侄子羅愛林是幫我辦私立大同中學的。改組派這伙人把學校搶去不算，還把他抓去關了起來，說他是國民政府蔣介石先生的走狗，真是豈有此理。揖老，您是我們安徽的鄉賢大佬，請為我們同鄉後輩主持公道吧！」他一聽之下，又驚又怒，說：「噢！有這種事啊？」我說：「千真萬確。您的朋友翟大勛剛從北平打電話來向我求救。」他驚怒之餘，就當我面打電話忠告閻錫山：「現在你們鬧得也太不像話了！羅開榜的

侄子羅愛林是很平實的一個人，他幫吳鑄人辦私立大同中學，你們說他是蔣介石的走狗，把學校搶走不算，還派憲兵把他抓了關起來，實在太對不起人了！」掛上電話後，王揖唐先生對我說：「閻錫山不知有這事。他答應立刻叫楚溪春放人。」我之所以找王揖唐因為那時閻錫山正要爭取安福系段祺瑞的支持，而王揖唐是段祺瑞的大將，閻錫山必定買王揖唐的帳。

在發動八百工人「修理」大同中學校長許孝炎等的教職員後，校內其他同仁對這次「意外事件」至感困惑，眾說紛云，莫衷一是。其中蕭忠貞最有見識，也最了解我，他對其他同仁們斷言：「一定是吳鑄人回到天津了！不然誰有這麼大膽子和氣魄，在這種情勢之下，還能發動工人用暴力反撲！」不錯，平常我是一個很隨和的人，但是遇到不講理的人和沒有良心的人，我是會不顧一切後果痛加教訓的。

為爭是非義理而戰

發生這事之後，大同中學急著派賀翊新、徐季吾兩人到天津來找我。當時在天津我住在胡適之先生的堂弟胡成之的寓所。賀翊新、徐季吾二人到了天津就直奔胡成之的寓所。事先我曾跟胡成之打過一個招呼，如有人找我一律推說我不在。但賀翊新、徐季吾二人因為我的關係，也認識胡成之，胡成之是個老實人，不好意思對他們說謊，就坦白告訴他們我在中原公司樓上吃午飯。我一見他們兩人就衝口責問道：「你們兩個還來看我幹什麼？你們簡直無法無天，太不成話

了！」他們二人哭喪著臉，尤其是徐季吾，那副可憐相，好像要淌眼淚的樣子。他們要求找個地方談談，我說有話就在這裡說，沒話就請便。他們就說：「外面人說我們實踐社鬧家務了！」我說：「實踐社已經解散，要說鬧家務的話那是你們在鬧，和我毫無關係。我到南邊去辦事，並未找誰惹誰，你們就趁機搶學校！你們要辦學校可以好好講，我一定樂於協助，何況我不久就要出國了你們何必搶呢？更可惡的是你們還貼那些「打倒蔣介石的走狗吳鑄人」之類的標語。」他們聽後手足無措，表情尷尬。

最後他們說明來意，是希望我寫一封信給周梅蓀。我問他們理由，他們支吾其詞的說是請周梅蓀他們不要誤會我們鬧家務。我不疑有他，就照他們的要求寫了。後來我才聽說周梅蓀在改組派把我趕出大同中學時曾為我抱不平的說：「這個學校是吳鑄人辦的，我們這些董事也都是他聘的，今天趁他不在，就把學校搶過來，實在太不像話了。」賀翊新、徐季吾二人騙我親自寫信給周，是要平息周的反感以達成他們改選校長的陰謀。果然，他們拿到我給周的信後立刻去見周梅蓀，並召開校董會議。周梅蓀既然接到我的親筆信，不明真相，就這樣糊里糊塗的改選許孝炎為校長。我一向對朋友最重感情，脾氣發完，氣消了，絕對不記前嫌。賀翊新、徐季吾二人就是利用我這「弱點」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我知道這個騙局後，更是怒不可遏。於是又和他們打了一仗。

當時有人勸我：「這一仗又何必打呢？你已

要出國了。」我說：「出國歸出國，這一仗卻非打不可！如果不打，正義不能出頭。這一仗是為爭是非義理，不是爭利害得失。勝了，固然很好，即使打敗了，也不要緊，只要正義能夠得到伸張就可以了。這和當年孫中山先生為爭取「開餘」，下令虎門要塞司令向英國軍艦開火是同一目的：不是要把對方打沉打垮，而是要把革命的空氣，也就是正義的伸張，打出去。」

為這事，後來陳立夫先生出面調解，我唯一的條件就是：校長人選必須由我推荐。由於我反對許崇智當校長，於是我推荐賀翊新出任校長。雖然賀翊新曾和徐季吾一同反對過我，但他做事認真負責，又有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和熱忱。

出國前夕諸事待辦

辭去大同中學校長一職之後，我就專心一意的準備出國深造。我選擇到倫敦牛津大學深造。因為英國是產業革命的發軔地，也是文明先進的國家之一。尤其兩所極古老而負盛名的大學——牛津和劍橋——制度完善，學術高深，人才輩出，為英國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搖籃。

民國二十年夏天長江決堤，華中大水災，我的家在北平，我的太太正在待產之期，但是我卻不得不在此時前往南京，向我最敬愛的長官陳果夫先生辭別，從上海踏上開往英倫的輪船，放洋留學。

在南京火車站，巧遇馮國璋時代的秘書長呂鈞（字習恆），同車赴滬。在車上他對我說：「鑄人兄：依我之見日本人可能要在北方製造事端

了。」我問：「何以見得呢？」他說日本人見到我們長江決堤氾濫成災，民生凋敝。民國十九年擴大會議之後，中原大戰，精銳殆盡。加以胡漢民被輾禁湯山，國民黨內部不能團結。這正是日本人趁火打劫的千載良機。我們全知道，日本對中國早有野心，只是未便下手。我說：「日本早有侵略野心，但是否真會全面出兵進攻中國？」

呂鈞說：「他認為目前還不至於發動大戰。原因是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找姚國楨兄弟去遊說段祺瑞，勸段祺瑞出面領導東北與馮玉祥閻錫山舊部成立「華北國」，以對抗南京的國民政府。換句話說，就是把中國一分為二。段祺瑞當時不能決斷，找王揖唐去商量。王揖唐這時卻能秉持春秋大義，對段祺瑞說：「你老人家年紀也大了，並非沒有做過國家元首，咱們也沒有把局面搞好。現在蔣介石對您老執門人弟子之禮，逢年過節禮數不斷。前年中秋節您老短三千塊錢，向龔仙舟借，他還唯唯諾諾的不大願意。依我看來不可以接受日本人的邀請，算了吧。」於是段祺瑞拒絕了日本邀請領導「華北國」，使日本製造華北偽組織的陰謀破產。

呂鈞是個老官僚，見多識廣，政治經驗豐富。他的判斷有相當的可靠性。日本人既有野心把中國一分為二，它是不會因段祺瑞的拒絕合作而死心的，一處走不通，必然另找出路。

我當時即將出國，心情異常惡劣，國內水災嚴重，太太臨產在即，自己卻必須匆匆趕赴英倫入學。然而呂鈞所言茲事體大，所以一到上海就立刻寫了一封信向陳果夫先生簡報旅途秘聞。

呂鈞是我們安徽同鄉的前輩。雖然我以前在北平曾發起過一次「安徽同鄉革新運動」，難免和安徽籍的老官僚們有所齟齬，但因為我們這些年輕人做事合情合理又合法，所以也贏得老一輩的尊重。到上海後，呂鈞先生堅邀我吃晚飯，為我餞行，但為我所婉謝，因為在上海我還有許多重要的事務待辦。

吳鐵城的高瞻遠矚

到上海的第二天，即往訪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吳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黨內的前輩之一，他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和林主席子超先生的友誼最為深切。見到吳鐵城先生我問道：「鐵城先生，我馬上要出國了，請問有什麼指教？」他說：「我說話你可不要介意哦，你到國外去，首先要將外國語文弄好。精通外文之後，聽課、讀書、交朋友才能應付裕如，這一點最為重要。你們今天到國外讀書，不僅僅要把書唸好，還要做一些國民外交的工作。」我問：「我們到學校去讀書，做什麼國民外交呢？」他說：「這你就不懂了。就是到學校才能做國民外交！我剛才聽你說你要進英國牛津大學，牛津大學對英國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等國家大事的決策，全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因此你對你的老師要敬重，對同學要傾心結交，有任何集會活動要踴躍參加，這全可看做是國民外交。」接著鐵城先生問我：「你家裡有沒有錢？」我笑著說：「我家裡錢不多，不過我向父親要，他會給我的。」他又問：「我們政府一個月給你多少錢？」我說：「二十鎊」。他說：

「二十鎊不夠用，最好再向你父親要二十鎊。」我說：「我明白了，多少我會請家裏補助我一點。」我的家雖稱小康，但每月拿二十鎊，也是一筆很大的負擔。那時候一英鎊要合十六塊銀元。要家裏每月貼二十鎊——三百二十塊銀元，是有問題的。

鐵城先生自奉甚儉，不是一個講究享受的人。可是他在事業上用錢，卻非常大方豪爽。所以當年他奉派去東北，從事說服張學良通電擁護和平統一建國的工作時，爲了達成任務，不惜耗費鉅資，用錢如流水，終於不辱使命。他曾說：「錢是死的，人是活的，錢要靠人運用才有價值。不會運用，萬金如糞土；運用得當，一錢逾拱璧。」這是鐵城先生的用錢道理。這個道理，對於我個人日後理財影響很大。

鐵城先生又問我什麼時候走，坐什麼船。我告訴他明天動身，坐日本船「蘇阿馬鹿」號。原來中央給我的旅費是二等艙價七十鎊，後來我想，同樣是長途跋涉，二等三等沒有多大差別，不如改乘三等艙，可以省許多。因此用省下來的將近三十鎊買了些書，治了些裝。那時與我同行的有葛覃兄，也是當年我們在北京比肩作戰的一個革命同志。他到英國後與曾約農先後同學，進蘇格蘭愛丁堡大學，也是英國有名學府之一。

後來鐵城先生叫我邀葛覃一同在他家吃便飯。那天晚上我們就在鐵城先生家吃饌別宴，菜餚雖不是頂考究，但非常可口。尤其是他對我們的衷心祝福與諄諄教誨，令人十分感動，真是悽悽長者的風範。席間他說了兩句高瞻遠矚的名言：

「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告誡我們以後要格外留心國是。席間我也把在京滬火車上呂鈞對我所說的話，轉述了一次。鐵城先生說：「有這個可能，可能就要出問題了！呂鈞講的很有道理。」

正好在我要離開上海的時候，「萬寶山事件」已經爆發了。這件事是我們在吉林省與朝鮮半島交界的萬寶山，因農民墾殖問題與朝鮮人發生糾紛而引起的。其間日警槍殺中國農民，事後日人在日朝煽動排華，中國人死難者逾千人。

船到新加坡，忽接太太電報，告訴我在八月八日這一天產一男嬰，取名鵬郎。喜不自勝。

記得八月二十九日，我們在馬賽登陸。因爲坐船坐得太久太累了，年輕人耐性又差，所以決定由馬賽改乘火車到巴黎。一來可以變換旅途生活，二來藉此觀賞花都。抵英不久中日即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自此日人謀我日急，被呂鈞先生不幸而言中。

前塵往事歷歷在目

由於出國前緊張忙累了幾天，上船後疲憊已極，倒頭大睡。一覺醒來，只見碧海青天，極目浩淼。一時身心俱爽，思潮洶湧，前塵往事，歷歷在目。

自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建，迄今二十年間，內憂外患，紛爭擾攘，無時或已。革命的浪潮風起雲湧，奔騰澎湃，衝破一切橫逆，克服萬般困難，終於打倒軍閥，解民倒懸。我們的國家在苦難中誕生，茁壯；個人也在革命的狂濤裏洗煉

成長。眼見中國就要真正統一強大之際不想日寇侵凌日急，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扼腕浩歎？

多少英雄豪傑，志士仁人，不計任何犧牲，投身時代洪流。革命的成功是歷盡千辛萬苦，由無數智慧、血汗、生命凝聚成的。我有幸躬逢其盛，生長在這巨變動盪的時代，也有幸在這革命建國的艱苦過程中貢獻一己之心力。

我自幼立志以科學報國，但在民國十三年北大生物系讀書時，由於一次偶發事件，使我一怒而投身國民黨，參加革命，從此與黨政工作結了終身不解之緣。

入黨之後，即在北大教授朱家驊、李石曾、譚熙鴻、顧孟餘、李大釗等人領導策動下，參加了一連串打倒軍閥的實際行動，例如民國十四年的「首都革命」，民國十五年的「反對關稅會議」與「三一八」慘案，我不但無役不與，而且是中堅幹部，爲民前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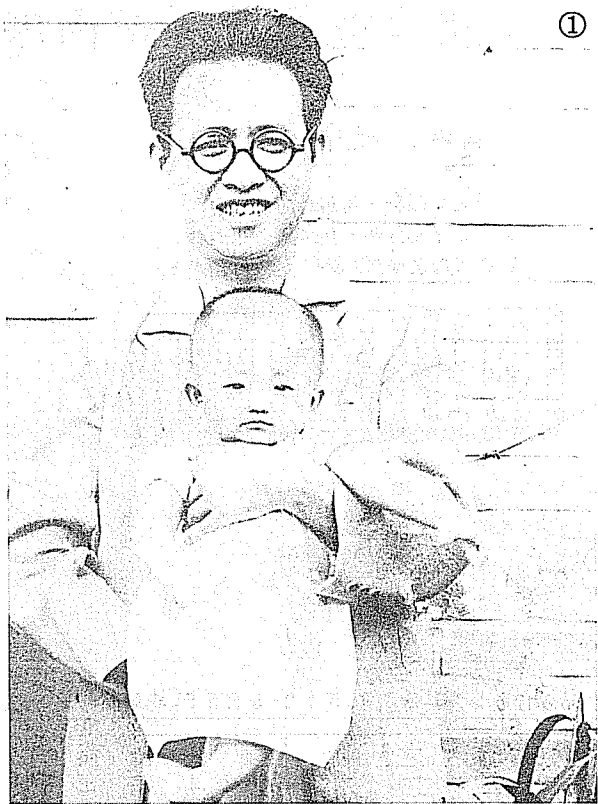
由於「三一八」慘案的發生，斷送了段祺瑞的政治生命。緊接著張作霖入主北京，撲殺國民黨同志不遺餘力。然而革命黨人反軍閥風潮，非但未見稍減，反而愈演愈烈，只不過由明而暗，從地上轉入地下而已。

民國十六年發生的「張作霖查抄北京俄使館事件」，犧牲了國民黨十三名精英。其中有我最敬愛師長之一的李大釗先生，生死至交鄧文輝、路友于以及摯友莫榮榮，使我悲痛愈恆。在此事件中，我也難逃被捕，因前一日適有公幹出城，而倖免於難。在事發後的風聲鶴唳中，冒死逗留北京，並爲死難同志收屍安葬，以成全同志之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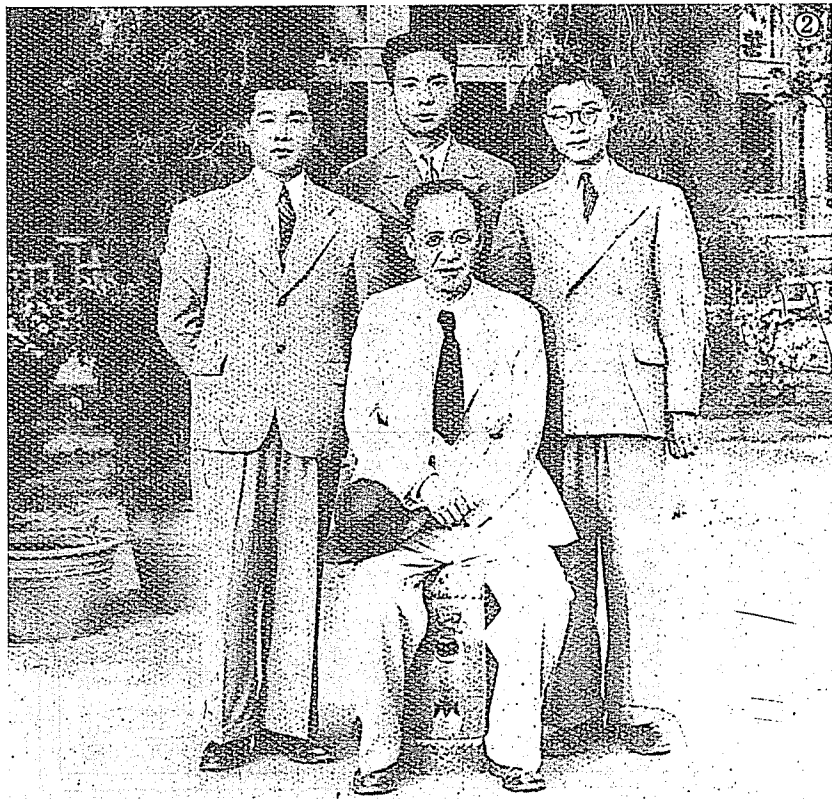
自民國十六年清黨，到十七年京津底定東北易幟，其間我們這些潛伏敵後，策應北伐軍的革命同志，與軍閥的鬥爭實處於捨生忘死的衝刺階段。為黨為國犧牲的烈士不計其數。十六年初冬，張作霖親下命令，指名逮捕我歸案。前日剛從北京胡適之公館微幸脫險，驚魂未定，不料次晨即在天津法租界又告落網。命不該絕，一時福至

①



①作者吳鑄人二十九歲時在北平家中與公子吳又熙（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合影。

②吳鑄人（前坐者）在北平與部屬合影。



心靈，居然策反成功。真是千鈞一髮，虎口餘生。

在國民革命軍旦夕收復京津之際，共產黨又陰謀製造「天津大暴動」，企圖阻撓北伐，幸經我及時揭穿詭計，未釀慘禍，也算是青年時代的一件得意之舉。

走筆至此，順帶一提：想起北伐當年，我們那一輩革命青年，為了主義信仰，為了救國救民

，甘願拋頭顱灑熱血，出生入死，那種冒險犯難的精神幾乎令人不可想像。

張學良通電和平後，表面看來似已全國統一，實際上軍閥餘孽馮、閻、張依然擁兵自重。因此，一經汪精衛煽動，即於民國十九年召開「擴大會議」，掀起「中原大戰」，導致國家元氣大傷，日寇乘虛而入。回顧多災多難的祖國，寧不使人痛哭失聲。（待續）